

兰草老师

□ 陈永平

主持人朝明转来一视频：“纪念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成立75周年——老广播艺术家朗诵会。”视频中，葛兰、方明、徐曼、常亮、张悦、金峰悉数登台，黄钟大吕，再现国之声韵。我听着他们的声音长大，他们是我的老师，尤其葛兰，给我特别的指导，我对她有感情。朝明知我！

上世纪80年代末的那个盛夏，我得到机会，到中央台参加播音培训。培训基地不在广播大楼，在翠微路翠微小学。刚放暑假，校园里异常幽静。报到处两位女士。一位是中年人，坐在窗下负责报名接待；一位年纪大一点儿，在屋内收拾东西，偶尔递一两句话。我熟悉这个声音，我在思索。中年女士会意，一指她：“葛兰老师。”葛兰老师浅浅一笑，过来问：“哪个台的？”中年女士抢着回答：“高邮台，江苏的！”

我和葛兰老师算认识了。她很朴素。我有一个强烈的感觉，葛兰老师开口说话，她是那个众人景仰的著名播音员；她上下忙碌的时候，也就是一个与我母亲年龄相仿的北京大妈。

我猜这种朴素的风格是一种传承，渗入中央台的肌理。北京是首都，得风气之先，也是时尚之都，但从服饰看，中央台的老师们明显与城市脱节。他们大都是中年人，却穿得老气、陈旧，或者随意。付华（妻王秀芬，北京亚运会开幕式《我爱你中国》演唱者）喜欢套一件无领的老头衫；虹云（专题片《话说长江》主持人）个头矮矮，与学员第一次见面穿大红套裙，推门进来像闯进一团火；方明的白色衬衣倒是熨烫过的，穿在身上很精神，可脚上套了一双高筒雨靴，站在操场上，乐呵呵地跟学员们合影。——那天天气预报北京有雨。我之前跟葛兰老师有过合影，临别前的一天她穿了件蓝色的无袖小褂，看着挺鲜亮，我跟她又拍了一张。她告诉我，穿这身行头，就跟学员们拍照的。

一天午休时间，我路过教工办公室，见到几位老师躺在条凳上，团扇蒙脸，睡得正香；葛兰老师则坐着假寐。我既感动，也有一丝惭愧：我是从床上，从蚊帐里爬出来的。

闲暇的时候，我喜欢跟葛兰老师聊天。她说她年轻的时候跟一位京韵大鼓演员学练声，还唱了段《过雪山草地》，有板有

眼，韵味十足。夏青老师（葛兰丈夫，新中国第一位播音指导）也跟去过，“他那嗓子！学那个不合适。”她模仿夏青唱了几句，咯咯笑起来。

葛兰老师也生气，我真见过。那天下午的课是由东方歌舞团化妆师教化妆，同学们趋之若鹜，排着队等，指望化妆师将他们点石成金，化腐朽为神奇。我长得不丑，却缺乏自信，后来从电台转电视台，正经主持节目屈指可数，而是更愿意坐在机房配音。我没有凑这份热闹，找到葛兰老师。教工办公室里，葛兰老师一个人坐着，一只胳膊搭在桌上，像在想心事。见到我她连连摇头：“咱跟她就一锤子买卖！”原来化妆师临出发前突然提出小车接。车费不在预算之内，葛兰老师很为难，跟化妆师商量半天，让她等着，找来一位大个子学员，一老一少一人骑一辆自行车，把化妆师从公主坟那儿驮过来。俩车四个轱辘，加一个著名播音员接站，化妆师还算满意。可葛兰老师很生气，她想不明白化妆师干嘛要摆那个谱！“得，咱还是那句话：就一锤子买卖！”

她们俩价值观不同，两路人，满拧！

朝明转来的视频里有一个细节：徐曼（新中国第一位广播节目主持人）拉着葛兰老师的手走上台，用她特有的柔曼嗓音告诉观众，当年就像今天这样，葛兰老师跟她手拉手，把她从中央台大门口领进播音室，以后又一字一句教她吐字归音。看到这一段我感到很亲切，我也有过徐曼老师相似的经历。

也是在聊天的时候，那位中年女士对我说：“我刚路过你们宿舍。谁呀，那嗓子！”葛兰老师一拍我的肩膀：“这儿有条好嗓子。”我很意外，我第一次听到有人称赞我的嗓子，而且是一位颇有造诣的播音艺术家，这对我是莫大的鼓励。培训期间除

了上大课，老师们也做分组辅导。葛兰老师认为我气息控制不好，找来一篇描写钱塘江潮的新闻稿，让我念“玉城雪岭，际天而来”。我有点上不来、压不住，葛兰老师一遍一遍示范，一段一段教，最后落在一句话上，反复数十遍，我都有些不好意思了，她却不急不恼，等到认为有那么个意思了才起身。“这句话有了，是个飞跃。”她说。

葛兰老师对我是有所期待的。培训快要结束时，学员们大都手拿小本儿，请同学、老师留言。葛兰老师给我留言：“陈永平同志，愿你成为一名优秀的广播工作者。”她说她是经过思考的，给其他同学就是个签名。第二年人民广播诞生50周年，她给我寄了首日封，特别关照有纪念意义，可以收藏。

那年葛兰老师已临近退休，但对奖杯后边乐此不疲，后与高校合作开办播音主持专业，推出许多新人。培训结束后，我于当年获得了扬州地区（今扬州、泰州市）播音作品评比一等奖，这是我平生第一个重要奖项，是参加培训的收获。不仅是播音技巧的提高，我从葛兰和其他老师身上感受到工作的热情，对我的人生观有积极的影响；以后我当“逃兵”换了工作（葛兰老师会失望吧），我觉得今天的工作也是有意义的，我保持着对这份工作的热情。这才是重点。

葛兰老师本名叫王静蓉，葛兰是播音名，跟夏青很搭配，都含绿色。由夏青播音的“九评”全部播出后，周总理到中央台视察，进门就找夏青，又请葛兰坐到他身边，问她：“兰是兰的兰吧？”她脱口而出：“不是，是兰草的兰。”

现场都认为葛兰老师紧张说错了话，也许吧。但我猜葛兰老师从一开始就没有以花自比，只认为是草，所以要急于表达自己的真实想法。兰花高洁，本质上还是一棵草。葛兰老师是中央台播音员，但她认为自己就是一个普通的女性。她喜欢草，是摒弃兰花孤傲自赏的一面，像离离原上草一样，将清心悦耳的声音向大地传播。我叫她“兰草老师”，绝非嘲笑，是发自内心的敬仰，对一棵草的敬仰。

您好，兰草老师！

莲的回想

□ 薛丰

火红的六月，回忆也哧地升腾起来，冒出一丝蓝莹莹的思乡愁，一点暖洋洋的念亲绪，那些乡间好玩的事，就像寄居在心里的一道彩虹，明艳，生动。这也是属于一对祖孙之间的事，小玲子与她爷爷的一场“较量”。

也就十岁左右的光景，一直在乡间晃荡的小玲子，身边难免有几个同类的小伙伴，每当盛夏来临，甩去书本后便三五成群地相约某处玩耍。较感兴趣的还是折莲花，一个岁数大一些的女孩子会告诉哪里最大片的荷塘。因为她参与的农事多一点，假如家中田地被分得远，便近似一场远足，在这个过程中，她会碰上最美最壮观的荷塘，然后干活也心猿意马起来。宽容一点的家长，便会怜爱地摇摇头：“回去做饭吧。”这时候她就像蜻蜓一样轻盈地飞到村子里，讯息也插上了翅膀，快速散发给等待中的小不点。劳累了半天的家人午后休憩，多半是问不到孩子的，尤其是女孩子，这是农村的事实，和现在没法比。她们有点迫不及待地集中到桥头，没有手机，却从不迟到，有的也许早就伏在同伴的墙垣外。没有零食，但是嘴没闲着，一会儿猜猜这个野花野草名，一会儿忙着驱赶或捕捉各式花样鸟雀，不知不觉便来到所说的荷塘。

这些如花的女孩，有着天生的粉红情结，可是面对这么多的荷花，竟然有点局促起来，因为这儿美得让人无所适从。在农村，几乎每一家不是有桃树、梨树、枣树，就是有石榴、枇杷，每一棵树都会开不一样的花，五彩缤纷，装点了院落与河堤。不过女孩子们唯独喜爱荷花，荷叶可以当成伞，正好挡住脸；花儿摩挲到脸上又清凉又带有一股馨香。淘气一点的，将连茎的花骨朵倒放着，假想自己是神笔马良，在空气中作画。最先“碰”到荷的是她们的鼻尖，因为其味袭人，带着甜甜的幽香，她们下意识舔了舔嘴唇，咽了咽口水，幻想着那白嫩嫩、脆生生的莲蓬子，好像是向她们露出微笑的牙齿一般。虽然她们小，但是也有自尊，谁都不想让大家看出自己的馋，克制着，只在心里笑。不能这样干巴巴地看着呀，于是她们再次相约，到时候会带上那种最大的塑料盆，或者扛着那种长长的、一端像弯曲的鸭掌的工具（用来打水草给家禽吃）。

过了几天，小玲子忽然发现

家里堂屋的木柜上、院子的水缸里摆放了好多荷花，她走上前去，“玉盘纤手弄清泉，琼珠碎却圆”。

有的完全开放着，有的花瓣还紧紧地包裹，吹都吹不开。虽然喜欢荷花，但她绝不要荷花以这种形式出现，它剥夺了“金桨木兰船，戏采江南莲”——采摘时的快乐，现成的东西未必讨巧。原来，不知是谁走漏了风声，小玲子的火爆性子的爷爷，操着镰刀，把凡是她们的手臂就能够着的荷花全割了下来，露珠在叶子上跌跌撞撞。她一个人也没告诉，偷偷来到荷塘，她看到，被割的痕迹历历在目，荷的眼泪还挂着，要滴不滴，残留在茎上。茎上已经锈迹斑斑，剩下的茎，没有了依托，成了光秃秃的标本。小玲子真想把她家的荷花嫁接上去，让它们继续生长，也好给小伙伴们有个交待。

爷爷对她的爱从来都是直来直去的、蛮横的，甚至是带有火药味的。记得有一次，小玲子有段时间身体不适，也查不出什么毛病，无精打采地一直延续到过年，爷爷索性把送麒麟的请到家门口，要他们对准躺在椅子上萎靡不振的小玲子就是放一顿炮仗，以达到驱邪的目的，把她吓得心惊肉跳，对爷爷自然是恨恨的。现在她产生了对爷爷“新仇旧恨”一起报复的念头，于是在一个傍晚，她躲进木箱子里，吓唬爷爷。不知不觉就困着了，迷迷糊糊地，依稀听到爷爷的叫唤，最后被饿醒了，才满头大汗地钻出来，无视爷爷铁青的担忧的脸。后来听家里人说，爷爷已经撑着船去荷塘找，就差打捞了，那些小伙伴也被他骂了一顿。

晚上，爷爷煮了好几只鸭蛋，把第二天的量也带上了。过去鸭蛋也不是常吃的，最起码要隔几天。老的“孝敬”起小的，把蛋黄淘到孙女碗里，一场干戈就这样化解了。爷爷也买了点肉，带上其它农作物，向种荷的那户人家打了招呼，当时船撑得急，竹篙挥舞，荷塘快被掀翻了。

又是一年赏荷季，想起当年的时光，老者在不在。

文 游 台

题字 殷旭明 责编 居永贵 版式 张勇

赖名好养活，小兔子是老L的乳名。

上世纪80年代初，小兔子是乡大会堂的一名临时工。乡大会堂，不仅政府、学校等用来开会，它还是全乡唯一的公共娱乐场所，故也有人称它为影剧院。小兔子就在影剧院里做一些会务保障、公物管理、安防等方面的工作，若放在那个年代的大型国有工厂里，小兔子干的这个行当就相当于厂里的俱乐部主任。

小兔子，年近不惑，穿着干净清爽，中等的个儿，梳着大背头，四方脸，浓眉大眼，笑起来露出几颗黄灿灿的金牙，仪表煞是俊朗，十里八村的人都认识他。小兔子有个漂亮的媳妇，模样俊俏，娇小玲珑，可小鸟依人了。这个媳妇可不一般，人家是上海来的下放知青，据说因为和小兔子邂逅，互相生情，后来就没有回城。小兔子的媳妇不但长得漂亮，关键还是个吃供应粮的城里人，这让多少庄稼人眼红啊！

计划经济的年代里，小兔子跟着媳妇不用种地，干着一份轻松体面的公家活儿，俨然也算半个城里人了。在孩子们的眼里，小兔子是个把门的将军，拥有至高的权力，没票想入院看戏，那是休憩的事儿。那时，常有周边各县文化局的地方剧团进驻影剧院，电影也是一年到头从不中断。小兔子把门验票，一本正经。影剧院门口有时会聚集几个少妇，她们搔首弄姿，看样子不打算买票，其中还有个女人嘻嘻哈哈地打趣道：“哎喂喂，你看小兔子那个死样哦！”说完，引得一阵哄笑。小兔子视而不见，不为所动。我父亲所供职的单位和影剧院共用一道围墙，跟小兔子也算是多年的老熟人了，一个周末的晚上，我想看电影，父亲便与小兔子通融，想贪个便宜放个孩子进去，哪知小兔子公事公办，根本不买账。

小兔子是个扬剧迷，他有得天独厚的条件，看戏可以不用花钱。戏开场了，常常是观众爆满，座无虚席。小兔子将场外铁栅门上的大锁一捏，拎把躺椅在剧场里随便找个空处便歪下身子，边上就着一壶浓浓的茶水。戏到高潮时，小兔子会情不自禁地从躺椅上跳起来，双手举过头顶，在人群中率先爆发出热情的掌声。“哎喂喂，你看小兔子那个死样哦！”观众中总会有女人这样嗲声地戏言，紧接着又是招来一阵哄笑。小兔子倒也不会生气，坦荡得很，他瓮声瓮气地回敬道：“人家戏唱得这么好，你们也不鼓鼓掌，一点礼貌都没有！”

看戏迷归迷，但小兔子吃公家的饭，门儿清着呢，屁股从来不在躺椅上，每隔半个钟头左右，他就会去配电房看看机器运转情况，生怕演出时发电机遇到故障，发生停电的纰漏；此外，他还打着手电去围墙查照一圈，看看有无翻墙入院的逃票鬼。他裤腰上挂着一大串亮晶晶的钥匙，伴随着脚步刚啷啷地作响，好生威风，叫人既羡慕又生畏。甚至那时，我常常想，我长大后要是能谋个像小兔子这样的差事，就算是坟头上冒青烟了。

时光不知不觉进入了上世纪90年代，影剧院开始公私合营了。小兔子头脑活络，作为影剧院的老员工，他轻车熟路，便承包了整个剧院，以院为家，甚至媳妇和女儿也住了进来。起初，经常会有一些外地的诸如戏剧、歌舞等演出团进驻，演出团会从门票的收益中拿出部分资金作为场馆租用费，加之小兔子的媳妇又在院内开了个小店面，专营瓜子、汽水等休闲零食，总体收益不错，日子过得倒也殷实。但小兔子的权力似乎没有以前那么大了，票是演出团自备的，把门的也换成了人家团里的人。这个时候，即便小兔子卖个人情想给谁免票，恐怕也不太好使了。

再接下来，文化局下属的剧团不再吃体制内的饭，纷纷自谋出路；曾在农村文化市场活跃一时的外地歌舞团，也因大量年轻人的外出务工而缺乏市场，最终也销声匿迹；电影逐步进行市场化运作，影剧院硬件配套陈旧老化，农村始终卖不起票房；更要命的是，电视早已普及到农村，农民足不出户就可以听歌看戏，等等，所有的这一切叠加起来，让小兔子的经营每况愈下。

2000年春节，我回乡探亲，在集镇上碰见了小兔子。多年不见，小兔子那一头曾经油光发亮的乌发已干涩花白，两眼浑浊，失去了当年把门时的犀利；他的俏媳妇，也不再有着先前的光鲜。小兔子喋喋不休地慨叹道，前几年他已不再承包影剧院，也从影剧院搬出来住了；现在的影剧院早已没了影剧；偌大的剧场和许多配套用房几乎闲置，只是影剧院前厅的三楼被人承包，开了一家卡拉OK厅，也就过年时生意好些，平时比较冷清……说完这些，小兔子无奈地摇摇头，转身怏怏地走了。我忽然发现，他的步履有些蹒跚起来。我立在原地，欲说无语，只静静地看着他的背影，直到消失在小巷的深处。

转眼又是10多年过去了，网络正引领着我们的文化生活。我们的那个乡，早已在农村区域划置的改革中撤销。如今，影剧院的大楼作为地标性建筑，依然屹立在那条老街上，只是它再也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影剧院了，甚至与文化已不沾边。今年回乡，听说影剧院在这10多年里曾作过工厂和仓库，现在它的前厅又被人开了农村淘宝网店；也有人说，影剧院已被富商买下，不久的将来，将办一个私营老年公寓。而当年能够叱咤整个影剧院的小兔子，早在10多年前已悄然离开了小镇，和媳妇回城了，目前在上海颐养天年。他现在已然是一个真正的城里人了。

时隔20多年后，我再一次走进影剧院，灰瓦青砖依旧。我似乎又看到了当年剧场的爆满，想着当年如何挖空心思地逃票。当然，我想的最多的还是小兔子。

兔子叔，你在上海还好吗？你兴致上来时，还会用那浑厚的男中音几嗓子扬剧吗？